

書 評

Reviews

《滄海遺音——民國時期清遺民詞研究》，林立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二年。四五八頁。

程中山，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高級講師

學界研究及整理宋元明遺民文學的成果很多，而關於清代遺民文學研究相對較少，蓋清亡較近，而且民初至一九四九年間，中國社會幾經動盪變遷，清遺民身分變得複雜，相關文獻也很散亂，研究頗有難度。加上近三十年的清末民初文學研究，重詩歌而輕詞學，雖然研究者已多就朱彊邨、王國維、況周頤等個人文學創作及詞學思想研究探討，著述雖豐，但多為專家式獨立個體或詞學史研究，而以遺民群體為題的專著則未見。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林立教授長於詩詞寫作，又專研近現代詞學，撰有〈滿清遺老陳曾壽及其詞〉、〈論陳洵及其海綃詞〉、〈論葉恭綽的詞〉、〈傳統與地域的探索：論羅忼烈的詞〉、〈群體身分的撮合：《滄海遺音集》研究〉等論文，述作兼備，成就卓越。二〇一二年，林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本書，是第一部集中研究民國時期清遺民詞人群體的文學專著，填補文學史的一段空白，極具開創性。

據〈卷首語〉可知，作者於二〇〇八年開始撰寫本書，並在二〇〇九年底完成。全書除了〈導言 時代的弱音〉及〈後話〉外，總共有五個章節：第一章〈泡露事、水雲身：清遺民詞人的身分與記憶〉、第二章〈闌干閒處戀斜陽：清遺民詞中的時、地、物〉、第三章〈群體身分的撮合：《滄海遺音集》研究〉、第四章〈同聲相應：詞社與清遺民詞人的集體唱酬〉、第五章〈意內與言外：論清遺民詞人的書寫模式〉，五個章節獨立成文，各有重點，合成一書，則互為呼應，互相補充說明，全面反映詞人群體的遺民意識。其中兩章內容已率先

發表於港臺重要期刊上：第三章發表在臺灣的《漢學研究》¹、第四章發表在香港的《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²，均為本書極精彩的章節。這部專著集中探討清遺民詞作，兼析詞學，選題清晰，內容扎實，論述精彩，作者以大量第一手文獻資料考察遺民生平行誼，詳細解讀文本，展現遺民意識，成果突出，對推動清末民初古典詞學研究，貢獻不少。

我們讀〈導言 時代的弱音〉，可知作者審視民初時代背景及文學思潮，反映清遺民生不逢時，政治上的失落不在話下，連所作舊體文言詩詞也因新文學崛起而為後世文學史家所抑壓，扮演雙失的時代弱音。然而，學術研究畢竟追求真理史實，作者指出遺民文學在民初及後來的文學發展史上扮演承先啓後的重要角色，務必為之重新鉤沉，以喚起學界關注現當代的舊體文學創作與研究。特別要指出的是，作者開門見山交代本書將採用西方各種有關文化記憶的理論去探討遺民意識，選用理論與詮釋對象，頗為匹配，蓋這些生逢易代的清遺民，所創作詩詞含有大量哀弔前朝、感懷故舊、詠物言志等題材，我們固然可以用傳統知人論世的方法去研究，但參考及運用西方的文化記憶理論，似乎更容易拈出詞作中的遺民意識及創作特色，而作者亦不摒棄中國傳統文論，兼採並蓄，反映其廣闊的研究視野，的確令人耳目一新。

談到遺民，很多讀者會想起遺老、遺少、逸民等概念。作者在第一章〈泡露事、水雲身：清遺民詞人的身分與記憶〉已清楚交代本書將採用「遺民」一詞，不用「遺老」，更不拘泥於政治遺民、文化遺民之別，力求寬鬆兼容，反映清遺民「在政治立場、文化觀念和文學趣味方面，都同樣表現得頗為保守」的特徵，為本書遺民稱名定調。繼而作者交代要眇宜修、幽微含蓄的詞體特徵，與質直的詩語不同，突出遺民於詩文外也喜以填詞來抒發個人遺民情懷，彰顯其獨特性，也為本書集中研究詞作而暫不詳談詩文立下注腳。

本書第一章、第二章、第五章都屬於遺民詞文本細讀的部分。第一章主要用文化記憶理論（如「集體記憶」、「選擇性記憶」等），從記憶的分水嶺、身分與記憶等方面，探討遺民在外觀稱號、行為思想等方面表現其遺民身分的自我認同，並進一步從其詞作中個人對清朝記憶的過濾及重構，以及通過比較朱

¹ 林立：〈清遺民的志業——論《滄海遺音集》的成書過程與編彙目的〉，《漢學研究》第28卷第4期（2010年12月），頁171-199。

² 林立：〈群體身份與記憶的建構：清遺民詞社須社的唱酬〉，《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52期（2011年1月），頁205-245。

彊邨、陳曾壽、胡嗣瑗、郭則澐、陳洵等作品，展現遺民群作品的集體記憶，做到文本細讀、理論精用的詮釋效果，特別是指出遺民往往在作品中以民初動盪的時局、劇變的文化帶出其對記憶中晚清承平時代的緬懷，呈現集體記憶的特色，論述頗具手眼。第二章〈闌干閒處戀斜陽：清遺民詞中的時、地、物〉，作者針對遺民詞中所記的時間（如紀年、節慶、壽辰）、地方（如愚園、巢園等）、實物（如蜜供、臘八粥、怡府角花牋等），析論遺民身處民國，心懷清室，以作品呈現今昔對比，時空迴環的特徵，突出遺民藉事物以自我省悟遺民身分的記憶角度，可見作者細緻舉例，分門別類，論析很透徹。第五章〈意內與言外：論清遺民詞人的書寫模式〉用西方記憶理論（如逆反記憶），以及法國文論家羅蘭·巴爾特 (Roland Barthes) 所提出的「讀者式文本」及「作者式文本」，並參照中國傳統賦比興、芳草美人、寄託等理論及在文學發展史下，互相啓發，相輔相成，分析朱彊邨、況周頤、王國維、陳曾壽、陳洵的詞作，帶出直言其事、無所託譬的詞作（如陳洵〈慶春宮〉），限制讀者的聯想，難受認同；而以曲喻比興的寄託作品（如詠物、意象、相思），則易於引起共鳴，以見民國遺民詞兩種截然不同的書寫模式。在文本分析中，作者特別於寄託方面大書特書，以菊花、梅花、斜陽、風雨、燕子、無題等題材作品為例，闡析遺民詞表現出常州派「意內言外」、夢窗詞風的寄託特徵，反映遺民貞潔的志節，感時憂世，對故國故君的懷念等，分析很細緻。而遺民詞中重複運用亡國典故，陳腔濫調，作者亦指出這樣「只會與它們原來饒有趣味的出處越來越疏離，變成乾巴巴的，胡適所說的死文字」（頁 353），持論中肯。

至於第三章、第四章，作者目光銳利，以傳統文人編纂同人別集、結社唱和等活動最能反映群體文化及價值觀的緣故，針對朱彊邨所編的《滄海遺音集》，以及春音詞社、瀕社、須社三大著名詞社，以見民國遺民建構群體，維繫遺民身分和群體意識的特色。由於涉及大量詩社人物、文獻資料，所以作者頗事蒐羅，考訂分析，歸納演繹，補訂很多問題，突出民國遺民群體的存在特色，這兩章是全書篇幅最多，論述最精彩的章節。就第三章〈群體身分的撮合：《滄海遺音集》研究〉而言，作者以朱彊邨生前收集沈曾植、裴維俊、李嶽瑞、曾習經、夏孫桐、曹元忠、張爾田、王國維、陳洵、馮开、陳曾壽十一家詞集而編成的《滄海遺音集》為研究對象，並以朱彊邨編集為討論中心，考訂十一位詞家的生平行誼及其與朱氏的交誼，反映朱氏編集可能受前代的《樂府補題》影響，蓋同樣為編遺民作品而成集，用意一致。筆者認為作者推斷成

立，足見朱氏有意編纂一部彰顯遺民意識的同人詞集。作者對《滄海遺音集》一書出版前後具體的情況，鉤沉特別深入，首先通過《詞學季刊》、《同聲月刊》、龍榆生〈朱彊邨先生永訣記〉等文獻，詳細考察《滄海遺音集》編撰及刊行過程，展現朱彊邨、龍榆生師徒交誼始末，以至朱氏授硯傳藝、名流題詠的雅事，到最後以刻印叢書相託，前因後果，縷析入微。更值得重視的，作者發現龍榆生因朱氏遺託而增印梁鼎芬《款紅樓詞》一家，並於在抗戰期間積極續編其他數家的史實，探討亦深。作者又於探討眾助印者汪精衛、葉恭綽等政壇人物背景時，指出「只要在文學上有共同的趣味，他們仍會走到一起，群體在政治上的區限亦因而被打破」（頁 158），這一點也正好可以解釋清遺民後來與民國不同身分的詞人往來現象，與後文互相呼應。至於《滄海遺音集》中各家的詞風，作者發揮其深邃的詞學根柢，並引用西方一些理論如解構學等，剖析各家詞風特徵，拈出同調與別調之分，當行出色。同調指陳洵、夏孫桐、李嶽瑞、馮開、曹元忠諸人與編者朱彊邨均學夢窗、清真或南宋風格；別調則指王國維、曾習經、裴維佞學五代小令、北宋婉約詞風，以及陳曾壽以哀怨、張爾田以沉雄、沈曾植以艱奧各成面目，與彊邨詞學審美觀略有不同，因此作者指出「雖然《滄海遺音集》並不是一部風格統一的詞人合集，但整體而言，追慕夢窗、清真以及南宋婉約詞風的傾向仍較為突出」（頁 205），判斷基本可以成立，同時也讓我們更清楚看到朱氏編集以傳主（遺民身分意識）為主，兼容各種詞風，重點在於建構遺民群體，意義深遠。

第四章〈同聲相應：詞社與清遺民詞人的集體唱酬〉，作者通過考察遺民在上海結春音詞社、滬社及在天津結須社的情況，以反映遺民「以雅集、結社和詩歌唱酬的活動方式來互通聲氣，除維繫彼此的交誼外，亦藉此提醒、重申各自的遺民意識和身分」（頁 81）。三個詞社在民初詞壇都很重要，前兩者在上海有前後相承的關係，後者遠在天津。一般詞社雅集活動，老少咸集，涉及大量清末民初人物及文獻，研究起來，頗費周章。因此，作者竭力蒐集詞社文獻，徵引各種碑傳及紀念詩文，下了很大的考證工夫，乃整理出遺民詞人之間交際結社的脈絡，並指出上海的兩大詞社社友背景很龐雜，天津須社社友身分多為單純的遺民，遺民意識特別強烈。當然作者也澄清不少問題，如確定滬社成立於一九三〇年；亦有存疑之處，如作者發現梁鴻志在〈滬社社友名錄〉中有其名而無其作的現象（頁 267），無法確定。其實，梁鴻志的確參加過滬社，據社友黃孝紓所作〈《爰居閣詩》序〉云：「是時歸安朱彊邨侍郎方舉滬社海上，

眾異（梁鴻志）來自大連，栖遲行館，會值邊警，留作寄公，參伍琴尊，駘蕩褻屐。」³ 據此可知梁氏因「栖遲行館，會值邊警」而短暫加入滬社，可能因此有名無作。畢竟人物太多，背景複雜，有時侯考訂不周，在所難免。除了林志宏先生指出本書數處史料判斷略有錯誤外⁴，作者就潘飛聲與遺民關係的看法亦可以商榷，如云「但像陳方恪、龍榆生、袁榮法、黃孝紓這樣的年輕詞人以及曾是南社社友的潘飛聲，顯然亦受到了他們的薰染，有時也以遺民的口吻來書寫」（頁 274）、「他（潘飛聲）亦不會因為自己曾是南社中人而不與遺民來往」（頁 266），其實早在晚清潘飛聲旅德及任香港《華字日報》主筆之時，已和很多朝廷使節官員交遊，其中曾與當時任廣東學政的朱彊邨在香港見面論世⁵，潘氏也一度準備應特科出仕，只是時局不就而罷。所以潘氏曾積極擁護清廷，入民國後與清遺民交遊亦十分正常，故不必計較其南社社員身分，亦如作者所說：「民國社會裏群體與群體之間的關係，並非是全然針鋒相對的，而是有其開放、磨合的一面。」（頁 313）反而值得關注的是第四章最後提到須社、滬社解散後部分遺民新結聲社（1935 年）、如社（1934 年）、午社（1939 年）等，結社年代分別在抗戰前期及期間，作者認為此時社友的遺民色彩稍為淡薄，可是未有進一步討論。或者我們可以推斷這種現象反映遺民思想隨時代而出現轉變，尤其是抗日戰爭對遺民思想的衝激很大，如筆者所知遺民楊雲史在抗戰期間曾撰〈攘夷頌〉歌頌蔣介石領導抗戰的功德⁶。當然，本書作者有意避開這種政治色彩強烈的課題及作品，拒絕對遺民詞人進行政治判斷，而專注探討遺民所整理的國故及文藝創作的特色，不過遺民與政治的關係到底密不可分，不能輕易繞過，尤其是他們有不少作品圍繞溥儀而作，如本書所引朱彊邨〈鷓鴣天〉、〈小重山〉、陳曾壽〈菩薩蠻〉、〈蝶戀花〉等，均可見一斑，但畢竟例子太少。因為身為遺民臣子面對歷史關鍵時刻，往往需要抉擇表態，如梁鼎芬在

³ 黃孝紓：《〈爰居閣詩〉序》，收入梁鴻志：《爰居閣詩》（1938 年刊本），頁 1a。

⁴ 林志宏：《〈滄海遺音——民國時期清遺民詞研究〉書評》，載《漢學研究》第 31 卷第 3 期（2013 年 3 月），頁 363-368。

⁵ 潘飛聲曾謂：「歸安朱古微侍郎（祖謀）視學粵東，告假歸里，過港作一夕談，商榷文史，虛懷宏獎，是翁蘇齋、朱笥河一流人物。出贈《彊齋詞》一卷，纏綿感喟，意在言外，是得清真神髓，當代無與抗手也。」，見潘飛聲：《在山泉詩話》（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5 年《古今文藝叢書》第 2 冊），卷 2，頁 12b。

⁶ 楊雲史（圻）著，程中山輯校：《江山萬里樓詩詞鈔續編》（香港：匯智出版社，2012 年），頁 378-380。

清末亡時所作〈讀史〉曾云「偶爲佳時歡夢寐，每從危日驗心肝」⁷，所以其時之思想及作品至爲重要。或者作者將來在後續的研究會重新審視這個課題。

另一方面，如本書介紹上海、天津的租界曾吸引大批遺民集居避世，但作爲舊都的北京，乃全國遺民集中地，遺民文壇亦盛，詩社詞社林立，其中一九二五年由廣東番禺譚篆青主持的聊園詞社也是著名的遺民詞社，他們詞作唱和歷經十年，比起須社、春音詞社、滬社運作時間早且長，研究價值亦大，雖然該社未見有詞集出版，但十年間不少社課已見諸報刊及別集之中⁸，性質與春音詞社相近，還是有跡可循，可以討論。然而本書只是在第四章註腳簡單提及以未能寓目社集文獻而罷（頁 237），沒有討論，頗爲可惜。雖然說天津須社，亦近京城，但聊園詞社始終就在皇城腳下，與上述三個詞社運作及社課內容究竟有什麼異同？值得比較論述。

再者，作者在考證詞社興衰及社友遺民情懷之同時，曾特闢一節用記憶理論學家珍納特·馬治奧 (Jeannette Marie Mageo) 的「圈內記憶」、克里斯蒂娃 (Julia Kristeva) 的「互文」學說，從互文角度考察天津須社作品的圈內遺民意識，如以〈百字令·柳墅感舊〉、〈瑞鶴仙·東坡生日〉、〈滿江紅·詠忠樟〉、〈還京樂·喜蒼虬至自海上讌集同賦〉爲例深入剖析，過程中作者還發揮其音樂造詣，附以音樂角度解釋詞作的互文特色，別出心裁，以反映同時同地、同調同題的社課所呈現的相同意象及衰殘情懷，突出遺民群體意識，可謂切中肯綮。雖然，作者強調本書只集中討論詞作，不及質直的詩歌，但是遺民也有不少詩詞同題之作，可以互相發明，如作者比較陳曾壽〈木蘭花慢·舊京移菊憔悴可憐感賦〉、〈惜黃花慢·園菊久萎，冬至日忽放二花，沍寒中金英燦然，喜成此闕〉與朱彊邨的和作（頁 136-137），以見其所寄託的遺民情懷，然而陳氏也有〈以舊京菊種移至海上寄養鄰圃〉、〈以京師菊種寄養蘇堪園中托之以詩〉詩歌同時同題之作⁹，甚至鄭孝胥亦有〈答陳仁先寄栽菊種詩〉和答，陳、鄭之詩比起詞作更明顯地反映遺民情懷，宜引爲佐證，更具說服力。另外，本書又指出遺民詩詞絕口不提現代的事物¹⁰，其實未必盡然，如夏敬觀一九二一年

⁷ 梁鼎芬：《節庵先生遺詩》（1923年刻本），卷4，頁2b。

⁸ 聊園詞社作品，散見《藝林旬刊》、《國聞週報》、《詞學季刊》、《湖社月刊》等刊物。

⁹ 陳曾壽著，張寅彭、王培軍校點：《蒼虬閣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40、48。

¹⁰ 林立：《滄海遺音——民國時期清遺民詞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

有〈郊外觀電〉、一九四六年有〈哥而夫球〉、趙熙有〈電鐙〉等詩寫及新事物¹¹，可以商榷。

以上介紹可見，作者對民國遺民詞人編纂同人合集、組結詞社活動，以及對詞作文本解讀，旁徵博引，兼採中西理論，研究深入，論述清晰，展現民初遺民詞及詞學的面貌，貢獻至大。而筆者所提出一些粗淺的看法，謹供作者參考及指正。至於本書在論述過程中附錄不少資料，如〈《滄海遺音集》詠物詞一覽表〉、〈《煙沽漁唱》內容一覽表〉、須社詞侶題名、滬社社友名錄、春音詞社唱和活動等，或表列方式，或附錄方式，並於作品統計、籍貫年歲，備註清楚，這對讀者瞭解遺民及詞社整體面貌很有幫助。

最後，作者以兩年時間完成這部極具挑戰性的專著，韋路藍縷，其中甘苦實非外人所能道。本書不但是研究民國遺民詞的首創之作，深具意義，而且從中也反映民國時期舊體詩詞發展、文人活動、文化傳承的特色，價值很大。作者在文中提及遺民題畫詩、聽曲生活等後續的討論課題，可見其專注研究的熱忱，令人敬佩。我們熱切期待作者下一部精彩的續編研究。

《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王汎森著，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二〇一三年。xxi+六八〇頁。

羅志田，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很多年前，王汎森兄曾給過我一份長約百頁的列印稿，討論清代文獻中的「自我壓抑」現象。他那時在考慮是否將其完善出版，想瞭解我（作為讀者）的看法。後來他漸多參與各類學術機構的「管理」，此書總未見出。故當我聽說《權力的毛細管作用》一書時，第一印象是這書終於出來了。拿到一看，已是一本六百餘頁的煌煌巨著，從清初到清末，廣泛論述了「清代的思想、學術

314-315：「另外需要一提的是，在詞作和遺民的作品中，我們幾乎看不到有關現代事物的描寫」、「他們在詩詞中絕口不提，大概是認為這些新式的事物與傳統文體格格不入，或者是要盡力在詩詞這種已逐漸為人冷落，但他們仍視之為最高雅的文體中，隱藏其世俗的一面，以與世乖違、不落凡近的文人形象示眾。」

¹¹ 夏敬觀：〈郊外觀電〉，《忍古樓詩》（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0年），卷9，頁7a；〈哥而夫球〉，《忍古樓詩續》（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0年），卷4，頁59。趙熙：〈電鐙〉，趙熙著，王仲鏞主編：《趙熙集》（成都：巴蜀書社，1996年），頁773。

與心態」。

在中國歷史上，清代是相當特別的。除相對短暫的元代外，它是秦以後疆域最遼闊的一朝，其廣土眾民的特性非常顯著。那是一個外族入主的朝代，後來又遭到前所未有的外國聯合入侵，故夷夏關係可以說與清代相始終。在這個因服色被改易而帶有鮮明外來色彩的朝代，卻又發展出後多稱為考據的治學方法，使人們解讀傳統經典的能力達到歷史的最高峰。根據彭慕蘭 (Kenneth Pomeranz) 等人的研究，那又是一個世界格局裏中西力量升降的時代——伴隨著「西方的興起」，中國在世界的地位急遽下降。清朝在應對內外挑戰中結束自己的統治，也連帶終結了中國幾千年的帝制。

過去的清史研究，政治史偏重制度與政策，像以前的戲曲一樣以帝王將相為主角，但在研究取向方面，多半是各取所需，缺乏類似思想史中「內在理路」那樣影響廣泛的典範。近年西方的「新清史」，又偏重清朝那超越於「中國性」(Chineseness) 的面向。本書雖明確以「思想、學術與心態」為重心，其實處處不離政治；作者既注重「探索思想家深微的思想世界」，復擴充到社會、生活的面向，關注「思想與日常生活世界的聯繫，觀察思想的流動、接受、擴散」(〈序論〉，頁 xviii)。

全書由五組文章構成，第一組包括〈清初思想中形上玄遠之學的沒落〉、〈清初「禮治社會」思想的形成〉、〈清初的講經會〉和〈何以三代以下有亂無治？——《明夷待訪錄》〉四章，探討明清思想轉型的幾個主軸：形上玄遠之學的沒落、經典考證及迴向古代之勢、政治思想的轉換，以及禮治理想之興趣；其中關於明清之交道德意識轉化的兩篇，即〈明末清初的人譜與省過會〉和〈日譜與明末清初思想家——以顏李學派為主的討論〉，側重「思想史」與「生活史」的聯繫，構成第二組。第三組處理清代政治壓力下文化領域中的自我壓抑的現象，包括〈從曾靜案看十八世紀前期的社會心態〉、〈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文獻中「自我壓抑」的現象〉和〈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現象——禁書復出及其意義〉三章。第四組轉向清代中期思想學術史，由〈程廷祚與程雲莊——清代中期思想史的一個研究〉和〈對《文史通義·言公》的一個新認識〉兩章組成。第五組為〈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國史儒林傳》與道光年間顧祠祭的成立〉及〈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現象——禁書復出及其意義〉兩章，論述嘉慶、道光、咸豐年間思想界的變化。

這五組雖各有側重，內容實交集互涉。用舊日的套話說，幾乎每一章都從

不同角度在探索上與下、雅與俗和知與行之間的通隔與合離，以及古與今（傳統與當下）、中與外之間的關聯。惟各章基本按時序排列，體現了對「清代」這一主體的尊重。附錄〈從東亞交涉史料看中國〉則提示了史學的新面向——不僅本書揭示的清代歷史已大不一樣，連看歷史的眼光或也需要轉變了。

思想、學術的主體是讀書人，與既存思想史、學術史研究相類，本書也注意探討形上玄遠之學的沒落、經典考證及迴向古代的趨勢這類學術、思想發展的「內在理路」，同時也關注黃宗羲、顏李學派等向為既存思想史論著關注的思想家，以及曾靜這樣知名而不以學問見長的儒生和程雲莊（智）這樣影響了很多人卻幾乎眾皆不知其所云的學者。尤其是書中探討乾嘉與道咸間顧炎武學術地位的轉變，不僅在時序上銜接了既存研究往往從乾嘉考據直通西學東漸的跳躍，更揭示出學術界從考證為重到經濟為重的思想轉向，是一個極為敏銳的觀察。

書中說，「乾隆末年以來，隨著社會、政治、經濟問題的惡化，有另一種顧炎武崇敬在緩緩崛起，它突出的是顧氏的經濟面」。作者引用李兆洛所說《日知錄》中言時務八卷，是「有用」之學，乃「為王者取法者」的見解。並指出道光六年魏源編成的《皇朝經世文編》，收入顧炎武文章達九十幾篇之多。這樣一種「顧炎武形象的轉變，事實上也與清代中期經史考證不再壟斷全域，出現了鬆動，多元的聲音開始隱然萌現，思想世界出現了由重考證向『經濟』、『明道救世』傾斜的新動向有關」（頁 592）。換言之，中國思想界的「經世」轉向，先於西潮的衝擊，且淵源有自——從清初的講經內容即可看到，「心性方面的問題逐漸被拋棄，而禮樂兵農成為後來人最重要的關懷」（頁 154）。

另一方面，阮元卻堅持「亭林之學，經史為長」的見解，他曾跋顧炎武的《肇域志》說：「世之推亭林者，以為經濟勝於經史。然天下政治，隨時措宜，……觀《日知錄》所論，已或有矯枉過中之處。若其見於設施，果百利無一弊歟？」這一見解也很值得參考。顧炎武、黃宗羲固素懷經世致用之志，卻皆乏實際的治理經驗，所以更多能「看到」問題，卻不一定善於「解決」問題。而阮元久任方面大員，顯然更瞭解「經濟」與實際銜接的一面。何紹基、張穆等顧亭林祠的創建者，亦皆有經世致用之志，卻大致與顧、黃相類，實際歷練不足，與阮元不可同日而語。

蓋顧、黃皆邃於經史，往往容易引經據典。而經典雖有面向未來的一面（如《周禮》），更多因應的仍是諸侯擁戴共主的三代問題。換言之，顧炎武有

意無意間更多是借助三代思想資源來解決秦漢以降大一統局面的問題，而作為其基本思想資源的三代卻和大一統有著重大的區別。這樣的主張若見於實際措施，可能真會有「矯枉過中之處」（在某種程度上，王莽和王安石的改制，都有引經據典之特色，也面臨同樣的問題）。

如顧所謂「大官多者其世衰，小官多者其世盛」，實推本上古諸侯國時代。以後世所治理的廣土眾民言，小官雖遽減而至於無（因民間的力量增大），大官所增實不甚多。類似見解，從顧炎武到孫詒讓，都有所申說，有力地影響了清末的改革。胡思敬敏銳地注意到，「光、宣末年所行新政，若裁胥吏，設鄉官，破除用人資格，其議皆自《日知錄》發之」。蓋亭林「論吏治，欲寓封建於郡縣」。而其具體舉措，則「稍有經驗者，皆知其說之難行」。

實際上，《日知錄》中欲「為王者取法」的，遠不止李兆洛所說的八卷。顧炎武自己明言，其「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卷。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便可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這些都「未敢為今人道」（〈又與人書二十五〉），顯然有所期待。不料後來影響雖不小，卻並非是「有王者起」，而是遇到了通常所說的衰世，頗具詭論意味。顧氏的經濟主張在後世得到貫徹，魏源編《皇朝經世文編》或起了相當作用，同時也與本書指出乾隆帝的興趣由理學轉向漢學對士大夫的影響相關（頁 401）。在道、咸新學「務為前人所不為」（王國維語）的同時，漢學卻成功地潛移默化到經世舉措之中，其間的微妙曲折，別有一番滋味。

通過對上述處於不同層面的思想者的探尋，作者要想瞭解「這個國家最有創造力的讀書人們，究竟被什麼問題所糾纏，想成為什麼樣的理想的士人？整個國家的自我形象及意欲是什麼？想成為什麼樣的國家」（〈序論〉，頁 xix）？後者尤其重要。若要認識清朝到底是否為「中國」，或在多大程度上「非中國」，實不能忽視「這個國家最有創造力的讀書人」，包括他們對自身，對國家的認知、想像與憧憬。看完這本大書所展現的「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對上述問題自有答案，儘管這不必是作者所欲追求的。

如果說讀書人是思想、學術的主體，心態就是一個涵蓋全部的領域。作者多年來都在提倡聯繫「思想史」與「生活史」兩個領域，本書中也有直接的示範。蓋「思想之於人們的日常生活，像是微血管般周流全身」。而「生活、制度或現實，當然也塑造人的思想」。兩者相互激盪，推動歷史的發展，也開啓一片廣大的研究天地。

本書充分發揮從「生活」看「思想」、從「思想」看「生活」的特點。在從兩者的關聯來「觀察思想的流動、接受、擴散」時，作者又特別關注「地方人士、小讀書人如何轉動整個學術及思潮的變化」。同樣，本書很多時候「重點並不放在中央的政策與作為，而是放在受眾」身上，強調「被影響者、被支配者們隱秘的、無所不在的消極性的創造力」，以凸顯「每一個『影響』不見得只是單純的由上而下的支配而已，它們往往既是『支配』，又是一個又一個『創造』或『再製造』。人們也可能盡其所能地『創造性』地減少或迴避影響與支配，而其最終的結果卻每每弔詭地擴大了官方政策的實際作用，形成一股席捲每一個角落的旋風」（〈序論〉，頁 xvii-xviii）。

清代不僅有全國性的訊息網路及訊息來源，同樣有地方性的。士大夫的「國論」與里巷間的「鄉評」，雖非截然劃分，顯然時有出入，有時甚至二分。而政治權力並不總是自上而下的，它還以各式各樣的運作方式，覆蓋到社會的方方面面，甚至深入到私人領域，形成一種「無處不在的潛在性剝削」。下層的庶民不僅有各類反抗剝削壓迫的技巧（例如那些印度 Subaltern Studies 所表現的），也常常在無意之中參與壓迫，並落實剝削的完成。換言之，權力的毛細管作用，不僅見於清代文獻中的「自我壓抑」，更「席捲了每一個角落」。這樣無處不在的現象，卻長期被遮蔽，本書將其整理再現，使清代歷史更加豐富多姿，確是別開生面。

清初禮治社會的建設，則是一個試圖溝通「禮」與「俗」的持續努力，承上啓下，影響深遠。有感於晚明風俗頹敗，社會秩序動搖，清儒乃從讀書人入手，要「以『士』為中心去釐定社會藍圖」。所謂「禮治」，「不是針對特定的冠、昏、喪、祭之禮節，而是認為整個社會國家都要納入『禮』的軌範」，有著「更廣大的關懷」。其做法是首先清整士人世界，其次則針對民亂以及社會的商業化，以禮抗俗，也以禮救俗，再次就是與民間日漸取得支配地位的佛道禮儀相對抗。所有這些舉措的共同點，都是要重新確立四民秩序，造成「一個在日常生活文化當中高下的區分，使得『禮』成為高尚的、理想的、新的標準」，進而微妙地改變人們「日常生活及行為世界『應該』追求的目標」（頁 43-44、85-86）。

禮治社會的實質是將道德的標準從「心跡」轉向「行為」，是一種「規範由『內』向『外』發展的新趨向」，從平常可見、可評估的行為方式入手，以「評判一個人道德的良窳」（頁 49）。依循顧炎武所說「自三代以下，人主之於

民，……凡所以爲厚生正德之事，一切置之不理，而聽民之所自爲，於是乎教化之權常不在上而在下」的思路，清初部分士人「提倡一種在『鄉』的層次，以儒生自發性的組織擔負起下層社會工作的路線」（頁 65）。其間「治生」是一個關鍵環節，卻也有著區域性的特色：一般地方的治生特別強調務農，並針對經商（頁 69-70）；而徽俗似稍有別，治生顯然包括、甚至就是指商業（頁 542-543）。

下層禮治社會的構建，針對大一統下廣土眾民現狀的長程社會變遷，可以連繫到一些極有識見的既存論述。蒙文通先生已注意到，宋儒與漢儒的一大不同，即其諄諄於基層社會教養之道；其「於鄉村福利，恒主於下之自爲」，故「重鄉之自治，而不欲其事屬之官府」¹²。余英時先生近更梳理、重建了王陽明從傳統的「得君行道」轉向「覺民行道」取向的思想過程。可知秦漢以後政治制度層面或缺乏對縣以下社會的經營，但從宋代起，士人的努力是持續的（也不時得到官家的支持），但似乎又顯得不那麼成功。

雖有前賢的努力在，究竟是什麼使得王陽明和清儒都好像是蕁路藍縷、從頭做起（至少他們很少感覺到前賢努力所積累的基礎），是一個非常值得繼續探索的問題。而清初的現象又更複雜，例如《家禮》就有著多面向的存在和意義，它似乎與「古禮」和釋、道儀式同時競存，彼此間都有不同程度的緊張。在儒家禮儀與佛、道儀式的競爭中，《家禮》代表著儒家（不要忘記佛教，至少藏傳佛教，還得到宮廷的尊崇）；而在士夫與俗人的緊張與對峙中，《家禮》又傾向於後者。

無論如何，與「得君行道」思路和模式不同的「禮治社會」，既是「士治社會」的一種表述，也是一種重塑。不論其在意識層面是否有此目的，它實際弱化了今日常提及的「國家」(state) 在公共事務中的作用，而讓「以『士』爲中心」的民間盡可能地自己管理自己。對「治生」這一關鍵環節的注重，具備了以自治取代被治的物質基礎。宋儒開始的「禮下庶人」努力，經明儒的「覺民行道」取向而完善。據天聽自民聽的模式，民與天的溝通要經過仲介來實現，而道則由經書以及讀經的士人來表述和詮釋；若在地普通人可與「天道」銜接，就從學理上確立「道在地方」的正當性，而民間的自治遂有自足的合道

¹² 蒙文通：〈宋明之社會設計〉，《儒學五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 133。

性 (legitimacy)。

在隋唐以後無鄉官的基層社會中，士紳逐漸興起，至明中葉大致定型。在縣以下的社會中，士人究竟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士與紳、士與平民究竟是什麼樣的關係，其實都還需要梳理。明末以後禮與俗那充滿緊張與競爭的關聯互動，揭示出社會的一個重要現象，即作為民間楷模的士人自己也出了問題（功過格更多針對庶民，而省過書則針對士人）。士人怎樣一方面自我調適，同時繼續其禮下庶人的努力，成為一個切近的具體問題。這個問題尚未釐清，中國就遇到前所未有的外來衝擊，科舉制的廢除終結了傳統的士，也徹底改變在地的紳。至少在中國大陸，無士的鄉鎮社會，正面臨著全新的重構。

對一本六百餘頁的煌煌巨著，很難在有限的篇幅裏綜合評論，更不可能面面俱到。全書勝義迭出，開卷即如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我印象很深的是，作者特別強調今人「絕不能以辛亥革命以後的觀點去想像清代官方文化權威的力量」（頁 598）。這是一個重要的提醒，所謂「辛亥革命以後的觀點」，不僅是一個簡單的時段意涵，實際代表著某種從同盟會到國民黨觀念的影響，在海峽兩岸都持久不衰，且其影響力遠超出一般的認知，很多人受其感染而不覺。只有將其置於意識層面，不時自我提醒，養成習慣，才能逐漸淡出其籠罩。

可能正是有了這樣的自覺，本書的眼光確與眾不同。自從有了歷史學系的科班訓練，不少學人有意無意間實際是面對「歷史學界」——而非歷史本身——立說和論證。本書作者視野寬廣，對既存中外相關研究及其背後的學理著述，皆耳熟能詳，如數家珍；而又眼光深邃，不僅見人所未見，更能循歷史脈絡的演進，將一些幾乎不曾被放在一起的問題結合思考。這些老死不相往來的論題關聯互動起來，便革新了清代思想史的認知結構和討論框架，使清代歷史的整體圖景煥然一新；既開拓了清史研究的新境界，更處處啟發讀者進一步的思考。

《文心雕龍·宗經》說：「《尚書》則覽文如詭，而尋理即暢；《春秋》則觀辭立曉，而訪義方隱」。本書實兼而有之。其文字曉暢，辭足達其所欲表之意；又善用史料，故常言人所不能言。作者對表述分寸的拿捏，尤非一般人所能及。故文字雖極清通，實則「辭約而旨豐」。讀者感覺「觀辭立曉」之時，或未必已悟其全部深意，恐怕還要追尋其論述的理路，方能暢解。

如作者所說，每份文獻都是一個「訊息包」，潛藏了各種訊息和動能。「每一次書寫，每一次重刊，往往都有政治史、思想史、心態史、文化史的含義，

同時也夾雜其個人的關懷與利益」(頁 480)。本書亦不啻清代思想、學術與心態的又一次書寫和重刊，讓人感覺到歷史的「過去性」和「現在性」構成了一個「同時存在的整體」(艾略特語，見〈序論〉，頁 xv)。我無意去猜測其間作者的個人關懷，但我確信，本書的影響必遠遠超越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史，它會改變我們對清代的認識，成為研究這一時段必讀的經典之作。

Shanghai's Dancing World, Cabaret and Urban Politics, 1919-1954. By Andrew David Field.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364.

陳碩文，中興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上海因其特殊的歷史背景，自清末以來，為中國中西思潮交會，新舊文化交融首當其衝之地。一九三〇年代，上海都會更蓬勃發展，有「東方巴黎」、「魔都」之稱，儘管在嶄新氣派的商店街後，破敗不堪的棚戶觸目可見；繁榮多元的文化出版市場更與燈紅酒綠的酒家舞場並立。一九四九年後，上海摩登暫偃旗息鼓，直至改革開放後，又漸展風華。上海都會文化在中西新舊文化折衝間經數十年演變，樣貌絕非單一，難以一言蔽之；其現代化之路與國族命運相連，複雜特殊，更成為探討近現代中國如何在現代化、全球化的浪潮下進行國族建構、文化轉化之絕佳案例，是故近年來備受學界關注。從都市治理、物質文化、翻譯交流、媒體出版等各種角度探討近現代上海的研究成果，可說從不同面向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文化的複雜面貌。

上海研究成為相關領域的熱點固然為時已久，然仍不乏精彩研究為之注入活水。費嘉炯(Andrew David Field)此書，探討上海舞廳，研究年代從民國初年跨越到中共建國後，從都會治理與舞廳文化之關係展開論述，乃在其博士論文的基礎上改寫而成¹³，為其積累多年的研究成果。上個世紀上海舞廳文化，誠如作者所言，是中西文化在上海交融的產物，並典型地展現其時上海人在租界文化的帶動下，接觸西方文化、現代生活的樣貌。跳舞，既是高雅的社交活動，而營業性質的舞廳，又具大眾化、通俗化的特質，反映上海都會文化雅俗

¹³ Andrew David Field, "A Night in Shanghai: Nightlife and Modernity in a Semi-Colonial Chinese City, 1919-1937" (Ph.D.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 2001).

並陳的一面；當時的舞廳以新潮絢麗的裝潢相競逐，然身處其中的舞女卻不乏強顏歡笑者，更充分顯現出貧與富之間的差異。上海舞廳因此不僅是上海摩登一景而已，更具體而微地呈現上海，乃至於中國衝撞顛簸的近現代旅程中諸多風景。此書以上海舞廳作為研究對象，其重要性由上可見。

以往學者論及近現代上海，或側重其摩登多元，或著重談其墮落罪惡，較難全面地呈現上海都會文化的複雜向度。然費嘉炯談舞廳，分析都會政治與舞廳文化之聯繫，以翔實資料釐清都會文化、市政管理、政治脈絡與舞廳之間的關係及互動；此外，還從建築外觀、營業狀況、舞業人員及舞客等面向，具體建構出上海舞廳的歷史，頗能兼顧兩者，使人一窺上海都會全貌。本書依上述兩個方向，分成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有五章，以舞廳的文化史與社會史論述為主，從「跳舞」此西風如何東漸上海談起，依序分析舞廳裝潢、舞女、舞客，闡述跳舞文化在上海逐漸商品化的歷程(1919-1937)；第二部分有四章，分別探討抗戰時期、孤島時期(1937-1941)、日本與國民政府統治時期(1942-1947)、舞潮案年代(1948)，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1949-1954)舞廳銷聲匿跡為止，舞廳與都會政治之關係。此書後記中略提及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及至改革開放時期中國的跳舞文化，至此略勾勒出中國舞廳百年面貌。此書研究範圍包括報刊、史料、文本、檔案、廣告、回憶錄、訪談，資料扎實，觀點全面，文字流暢，書中所收照片、圖表亦頗可觀。書後所收附錄，其一是上海大滬舞廳(The Majestic Café Company)的個案研究，分析其營業、所有權概況，並列出營業收支圖表等；其餘分別是上海公共租界合法營業舞廳的舞女人數統計表(1941-1942)、舞廳從業人員人數統計(1947-1948)等，亦頗為翔實。下文將分為兩部分，先簡介本書內容大要以及貢獻，後對本書觀點提出評述。

此書首章為導論，交代此書旨趣，呈現此書架構：先分析爵士樂、社交舞如何在一九二〇年代從西俗變為一般市民休閒娛樂，接著考察三〇年代上海舞廳之發展如何糾葛於戰前戰後複雜的政治文化中，最後，以探討中國當局在一九三〇、四〇年代管制舞業的原因和方法為總結。首章亦談及此書主要參考的兩種材料：(1)一九二〇至一九三〇年代上海西人的回憶錄或見聞，(2)中國人的記錄和觀點，亦包括文學作品。作者並進一步以穆時英為例，說明當時許多中國作家、藝術家、電影工作者和記者，其筆下的舞廳「概括了現代都市生活的瘋狂步伐」(p. 8)，象徵了享樂、墮落的生活與消費模式。作者認為，穆時英筆下的上海舞廳，有如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在其「拱廊街

計畫」(The Arcades Project) 中揭露的十九世紀巴黎拱廊街一般，是展示「現代性的夢幻世界」(Dreamworlds of Modernity) (p. 4)。然而，它亦深深嵌入一個複雜的政治網路中，為各種政府、幫派、警察制度所規訓、管理；而三〇年代在舞廳享樂的上海市民，很難不察覺到這個複雜的脈絡。確實，上海因其特殊的歷史背景，市政管理、人口結構十分多元，此亦是其都市研究之價值所在，而舞廳，即是此複雜面貌的一個縮影。

本書第一章“From Grand Balls to Jazz Cabarets: Westerners and Jazz-Age Culture in Shanghai, 1919-1926”（從舞會到爵士舞廳：西方人和爵士年代文化在上海，1919-1926），探討上海跳舞文化的起源與變遷。文章從十九世紀末在滬西人時常舉行凝聚共同感與民族意識的社交舞會談起，接著闡述在一戰結束後，發跡自美國，在歐美各地流行的爵士文化如何進入中國，形成熱潮。而在營業舞廳如卡而登 (Carlton Café)、大華 (Ambassador Ballroom) 紛紛出現後，亦有爵士名家受邀來華演出，爵士樂曲遂逐漸流行滬上。此一來自美國爵士年代的跳舞文化不同於大型社交舞會，具自由、奔放、開放的特質，因此有助於打破社會、文化屏障。作者總結道：此一爵士年代文化的流行，「引領了上海國際都會主義新時代的到來」(p. 51)。

第二章“Turning Lazy Opium Smokers into Spry Jazz Maniacs: The Rise of Chinese Dance Madness and the First Chinese Cabarets, 1927-1931”（懶惰老鴉片鬼變成活潑爵士迷：中國跳舞狂潮與中國第一個舞廳，1927-1931）闡述一九二八年前後在上海灘興起的營業性舞廳與跳舞熱，為市民打開了一個全新的休閒生活空間。造訪舞廳的人，自與電影、文學、藝術相關的人士，漸漸普及於一般民眾。通俗作家周瘦鵑，在其有如舞廳指南的作品中，展現了當時舞廳的生態情狀。作者更指出，舞女的出現，「在中國舞業的發展上扮演了關鍵性角色。」(p. 65) 對當時人來說，能與象徵「摩登女性」的舞女在一個充滿異國情調的空間共舞，使人得以抽離日常生活，彷彿進入夢幻世界；而此幻影中亦可說投射了中國人對新時代的想像。

一九三〇年代上海各大舞廳的位置、外觀與裝潢，是第三章“Towers and Palaces: Ballroom Architecture and Interior Design, 1929-1936”（高樓與宮殿：舞廳建築與室內設計，1929-1936）的主要內容。儘管國共兩黨爭鬥不斷、中日關係緊張，一九三〇年代的上海娛樂業仍蓬勃發展，電影院、遊樂場和舞廳繼續湧現。上海舞廳多位於租界內，建築設計光鮮亮麗，極富異國色彩，具夢幻氛

園。當時較出名的豪華舞廳如百樂門、仙樂斯、逸園大舞廳，皆備有大舞池及世界級的爵士樂隊——如 Buck Clayton 和其「哈林紳士」(Harlem Gentlemen) 樂隊；較次級的如維也納、揚子飯店舞廳亦備有舞池，為上海市民建構起一個美妙的新世界。

一九三〇年代以來，上海的營業性舞廳日漸增多，跳舞文化亦漸普及，中國舞女人數也相對增加，舞女及舞廳幕後消息，成為各式報刊關注的對象。通過報刊媒體的建構，上海舞女成為「美麗但又危險」的現代女性象徵；在她身上，凝聚了時人的現代想像。此書的第四章“Important Attractions: Cabaret Hostesses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Cabaret Culture in Chinese Society, 1932-1937”（重要的吸引力：舞女和中國社會舞廳文化的大眾化，1932-1937），便著重分析特別關有舞場專欄、銷量不錯的《晶報》，以探討上海舞女在報刊上呈現的形象，並論及其生活與收支狀況，與舞客間的關係，舞后選拔會等。作者並將舞女與現代性的兩面——危險與愉悅——並置；亦即，上海一九三〇年代舞女的生活和形象，實則反映了現代都會生活的一體之兩面——都會既使人們較以往更容易聚集，但都會生活的冷漠，亦易使人們感到漂浮失根，有如舞女時常看似摩登，實則淒涼的命運。

一九三〇年代，舞廳亦可視為轉變中的中國之象徵，一個中西交會的混雜 (hybrid) 空間，時髦的上海年輕男女在其中展示其西化、都會的生活方式，然批評的聲浪亦不曾間斷。在第五章“Improper Amusement: Chinese Patrons, Chinese Nationalist Politics, and Cabaret Culture, 1932-1937”（不合宜的娛樂：中國舞客、國府政治與舞廳文化，1932-1937）中，作者爬梳報刊，以探討舞客組成，當時報刊對舞廳文化的反思，還考察當時舞廳的表演節目、跳舞比賽及性議題。本章指出，隨著跳舞成為受歡迎的消閒娛樂，與之相關的活動、產業也紛紛開始出現，如跳舞學校、跳舞大賽等。然在一九三四年國民政府推動新生活運動後，一連串關於舞廳文化如何影響中國社會的廣泛討論，對舞業形成壓力。舞業所發起以募款為名的跳舞競賽，倡導在舞廳使用國貨，演奏中文歌曲等，便反映了其彌合愛國思潮與跳舞文化的努力。

此書第二部份則自第六章開始，重點放在舞廳文化與都會政治的討論。第六章“Ballrooms and Bombs: Cabarets, Underground Intrigue, and Occupation Politics, 1937-1941”（舞會和炸彈：舞廳、地下密謀、日本占領時期政治，1937-1941）主要考察了上海孤島期間 (1937-1941) 的舞廳文化。中日戰爭初

期，租界尚能維持中立，依舊弦歌不輟，吸引人潮，作者認為，此乃因舞廳提供了戰時人民逃避現實的娛樂空間之故。在本章中，作者還進一步討論上海舞場經營如何糾葛於繁複的政治網絡中，涉及了各國勢力、政治派系、幫派、資本家間的周旋協商。一九三〇年代晚期，舞廳更成為各種密謀詭計的源頭，爆炸案、暗殺案等暴力事件頻傳，舞廳成為抗日志士，乃至於黑道分子活躍之處。通過對親自走過這段歷史的舞廳從業人員訪談，本章揭露了上海複雜的政治網絡，以及各種勢力如何掩藏在上海歌舞昇平的娛樂生活背後，為本書尤其精彩的一章。

上海摩登之探討，多止於一九三七年戰爭開始、上海黃金時代宣告結束之時。本書的另一個貢獻便在於繼續考察了舞廳文化在中日戰爭期間與其後的發展。本書第七章“Regulations and Interventions: Cabarets under Japanese and Nationalist Occupation 1942-1947”（調整與干預：日本與國府統治期間的舞廳，1942-1947），從都市治理的角度探討了日本和國民政府統治上海期間對舞廳的計畫性管理。一九四二年前後，日人在上海推行「保甲」制度，並成立「上海舞廳商業同業公會」等組織，後者在當局監控舞業大小事上發揮不小的作用。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國民政府重新掌管上海，並取回租界治理權，立即再次展開其重建大上海計畫，並沿用日本統治時期的若干制度，如以同業公會作為中介，針對其所認為相當破壞社會秩序及道德的舞廳進行管理，包括核發執照、統計舞女人數、蒐集舞客資料、收取娛樂稅及印花稅等。此時，由舞業從業人員及樂師所組成的工會也陸續成立，在政府干預舞業的同時，舞業人員也開始為自己的利益採取行動。

國民政府的禁舞行動終於在一九四八年引爆了「舞潮案」——一個大規模的舞業人員暴力抗議行動。本書第八章“Resist to the E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s Ban on Cabarets and the Dancers' Uprising of 1948”（抵抗到底！國民政府禁舞令與1948舞潮案）便專論此次事件的前因後果，並通過梳理此案，略為評價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的最後統治階段。作者指出，在一九二〇年代，國民政府便試圖禁絕上海的舞廳文化；一九四五年後，在其將上海治理成中國現代化櫥窗的思考脈絡下，舞廳被視為罪惡的淵藪，道德墮落的象徵，更成為其首要整頓的目標。一九四八年一月，因協商破裂，當局下令陸續關閉舞廳，數千名舞業從業人員因生計受影響，聚集警局前抗爭，引發了暴力攻擊事件，致使數十人遭逮捕受審，當局則暫停關閉舞廳作結。舞潮案究竟是否出於

預謀？受誰指使、煽動？陸續引發一連串的討論；然舞潮案在國民政府統治末日之前夕爆發，作者認為，更揭露了此一時期中國社會中存在的緊張關係。通過探討舞潮案之因果，作者在此章中爬梳了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上海複雜的政治情況，並從側面刻畫國民政府在中國的末路圖景，足見其用心。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共產黨政府在一九五〇年代成功地關閉上海的舞廳以及其他娛樂產業，在此書第九章“Building A New Society: The Demise of Caberet under the CCP. 1949-1954”（建立新社會：中國共產黨統治下舞廳的終日，1949-1954）中，作者主要論述共產黨如何吸取前人失敗的經驗，漸進地禁絕舞業。建立無產階級社會既是中共政府的施政理想，禁制舞廳自然成爲其建國後之目標；但與其斷然關閉，當局決定漸進處理，多管齊下：如善用公會協調輔導，加收賦稅，教育從業人員轉業等。此外，共黨政府大力宣傳舞廳是舊社會象徵，象徵布爾喬亞階級不良習尚，並有違其婦女解放理想，在新時代應加以禁止，亦頗收成效。一九五四年底，上海僅存的舞廳遂陸續轉型或關閉，繁華一時的上海舞廳遂落下終幕。

然地下舞廳或舞會並未從此在中國絕跡，直至大躍進期間，聯誼舞會仍時有所聞；改革開放後，跳舞文化也迅速在中國——尤其在上海——回魂新生。作者在本書後記中，還提及受惠於上海一九三〇年代跳舞文化的港臺流行文化。而時至今日，隨著商業發展及越來越多的西方人和海外華人回到上海，上海夜生活的第二次革命在一九九〇年代後逐漸啓動。曾席卷上海，被戰爭、革命粗暴打斷的夜生活文化與現代夢幻世界得以還魂重生，迪士可、KTV 和更多的公共娛樂場所再次林立。上海，進入了更具攻擊性的全球化資本主義世界。

回首這百年變遷，上海舞廳雖一度成爲一個失落的世界，難以重返，然通過作者筆尖，縷縷歷史幽魂逐一顯影書扉，彷彿一日未曾散去。費嘉炯此書以開闊視野探討上海舞廳，以及其與都會治理、政治脈絡等之關係，較全面地呈現了二十世紀上海都會文化。此外，舞業在上個世紀中國的數十年興衰起伏，事實上與戰爭、革命等中國整體政治文化和現代化的綿長路途關係密切。此書研究上海都會文化，著重還原其時都會政治、近現代歷史脈絡，不僅幫助讀者理解現代上海摩登風華，更進一步地幫助我們認識中國二十世紀歷史——一個包含著斷絕與新生的時代，從而凸顯現代上海都會文化之研究價值。

此書較作者之博士論文更進一步，研究時間下限從一九三七年延長至一九五四年——舞廳文化在上海熄燈爲止，更全面地呈現上海夜生活與現代化

之路的全景。此書討論上海舞廳與都會政治，因涉及的研究年代長，研究範圍多元，探討的層面亦廣，觸及了中國現代性、印刷文化、國族建構、民國史、全球資本流動等議題，富有卓見；然也因本書包含了許多論題，而書籍篇幅有限，因此其論證也偶爾受限，沒有全面展開。

首先，在資料運用方面，本書參考徵引與舞業相關之資料，包括報刊、文學作品、歷史檔案、圖片等各種材料，十分翔實。其中，梳理《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等西人報刊及西人紀錄、回憶文字，以呈現當時上海西人社群的舞會樣貌、西人回憶記述中的上海舞廳文化，頗有貢獻。論述上海黃金時期的舞廳文化，作者則多引用暢銷小報《晶報》以探討中國人對舞廳的看法與輿論，亦見用心。然而，同一時期在上海發行的中文報刊甚多，尤其如大報《申報》，或晚清各大報刊上與舞廳相關之討論，亦相當豐富，在凝塑上海都會、舞女形象上，有其重要性¹⁴，相對之下，卻較少為作者關注。

另外，本書探討上海舞廳文化蓬勃發展的外來影響，分析深刻，然對於中國人接受舞廳文化的內在因素，以及舞廳文化與二十世紀初全球的文化流動等多方面促成跳舞文化在上海發展的原因，則較少討論。首先，清末以來，跳舞西俗，在中國社會原流傳不廣，但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頌揚民主與科學，撼動舊傳統，鼓勵婚姻自由、女性解放，社會風氣一時大開；而隨西風日益東漸，越來越多的留學生、文化中介者通過譯介，聯繫起中國與西方世界的文化交流，增進彼此之理解，於是一般市民對於西方社會、文化形式的接受度大增，跳舞文化遂能在上海漸漸普及，此為其前因。

此一對於跳舞文化從陌生、質疑、接受的歷程，並非中國獨有，跳舞文化在歐洲數百年來的發展，亦是在與保守勢力的拉扯中，逐漸受到認可，並發展為日常交際活動。尤其作者在本書中曾論及，一戰後發源自美國的爵士文化風潮，是逐漸流行於世界各地，並吹向上海，帶動上海舞廳文化之發展，使上海逐漸發展成歌舞昇平之國際都會，乃至與巴黎齊名。也就是說，如同前人研究所指出的，中國舞廳的出現時間其實不十分晚於歐美¹⁵，舞廳文化在上海漸

¹⁴ 李楠、馬軍曾運用小報資料研究上海都會文化；後者尤專論舞廳。參見李楠：《晚清、民國時期上海小報研究——一種綜合的文化、文學考察》（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馬軍：《舞廳·市政：上海百年娛樂生活的一頁》（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

¹⁵ 安克強 (Christian Henriot) 著，袁變銘、夏俊霞譯：《上海妓女：十九—二十世紀中國的

興，實乃發生在一個全球文化流動 (cultural flow) 的脈絡下，在一個音樂、跳舞文化、電影產業在世界各地同步流行的網絡中，進行著音樂、舞蹈、金錢、種族各方面的交流，並在上海這個特殊的口岸體系中，展現其獨特面貌。除觸及了殖民現代性的議題外，中國現代的各種文化生產，也可說是與在此全球框架中發展的文化進程並行。由此，則中國現代性就不能被視作中國面對西方文明衝擊的回應，或是一「遲到的現代性」，而有其獨特樣貌。然在本書中，此一對上海舞廳文化與全球文化流動網絡的相關討論，並沒有全面開展，是較為可惜的一點。

舞廳文化如何通過文學作品與報刊、音樂、電影、時人回憶等媒介，在文學想像、報導、回憶的層面上，於上海通過各種論辯、商業運作等互動，造就各種意識形態以及都會文化想像辯證的空間，甚或形成一種「媒介迴路」(media loop)¹⁶，可論之處很多，本書雖論及此點，惜未深入。再具體來說，以舞女形象為例——如前行研究者與作者指出——時常被上海作家描寫為現代都會之象徵，著重突出其樣貌、舉止中西融合的特點；時而，則又會被報導、形塑成爲求生存，堅毅果敢的女性形象，象徵了堅忍的中國。而在當時左翼陣營的作品中，通過類似的生產機制和媒介（報刊、電影等），舞女則被呈現為備受壓榨、掙扎於社會邊緣的待解放女性形象，如同上海（中國）的象徵。上海舞場的摩登繁華，固然是上述左翼作者欲批判的對象，然此摩登繁華也被操作以闡揚其理念，足見此議題之呈現涉及了各種文化想像與意識形態，樣貌複雜，值得細緻處理。

再說到舞女成爲上海現代報刊關注的焦點，識者或能指出，此與五四以來中國文化場域現代性建構與新女性論述的連結有關，如周蕾、周慧玲的研究所顯示，對舞女的集體消費，源自於一種現代的「偷窺主義」¹⁷，作者亦曾論及。然報章媒體外，在當時的其他文學作品、電影和流行歌曲中，亦有許多關於舞場或舞女的描述，從各種方向共同建構出舞女形象。不過，舞女既是報刊、文

賣淫與性》(*Belles de Shanghai: Prostitution et sexualité en Chine aux XIX^e-XX^e siècles*)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頁113。

¹⁶ Andrew F. Jones, *Yellow Music: Media Culture and Colonial Modernity in the Chinese Jazz Age*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99.

¹⁷ Ray Chow, *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West and Eas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p. 171.

學作品描述的對象，但她同時也是一個體，身處於社會與歷史結構中；她既受限於社會意識形態所虛構出的性別角色，實際上也存在於這類性別角色之外。作者在本書中通過文學作品中的舞女，以及舞女生平考察兩造並陳，呈現出以上兩種論述舞女議題的角度；然如能從性別角度出發，對舞女自敘生平或回憶錄加以梳理¹⁸，或對新感覺派作家刻畫舞女的小說（如施蛰存的〈薄暮的舞女〉）細讀分析，或更能在對照互見中見前人所未發。

作者在書中亦指出，爵士文化的流行，提供中西男女老少各色人歡聚的空間，造成打破藩籬的效果。在上海，此一爵士年代帶動的舞廳文化，更有助於消除華洋雜處的海「半殖民地」(semi-colony) 社會中不同階層間的隔閡，迎來了上海更具國際都會主義 (cosmopolitanism) 氛圍的黃金時代。作者還進一步指出，舞廳文化反映了中國社會漸受西俗影響，兩性關係以及社交模式逐漸開放，展現了流動的兩性關係。然而通過以上觀點，我們可更進一步去思索的是，這些看似區隔或對立的疆界，除了如本書所指出的，是租界與華界的分治與隔閡，男與女的性別差異，更可能是現代文明與傳統中國的歧途，也可能是都會與鄉野生活模式的區別。此外，(半) 殖民體制 / 性別 / 階級隔閡究竟是否被跨越了？如何跨越？似乎還需要周延論證。

作者在此書中挪用班雅明談拱廊街的觀點，以對比上海舞廳，以為上海舞廳是「現代性的夢幻世界」(p. 4)；進一步來說，即作者認為上海舞廳如同巴黎拱廊街，形塑出一個以物 / 符號為主的消費空間，甚至創造了一個堆疊物 / 符號的夢幻世界，製造豐富錯覺——漫遊者為商品著迷，而上海市民則對舞廳提供的明亮現代西方入迷——此對照堪稱有效。若沿著這個思路再進一步思考，作者在本書第三章中指出，當時上海舞廳建築、裝潢十分富異國情調，亦即具有一獨特的他方感 (elsewhereness)、形塑了一個異國化的氛圍，彷彿在召喚著另一個時空。然在這市民消費異國感的經驗中，視覺媒介其實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尤其是當時逐漸在上海興起的好萊塢電影。電影通過視覺呈現，提供觀眾一個嶄新體驗，將觀眾從此時此地帶到另一個地方，挑戰其對真實的想像。具體來說，當時在上海上映的以舞廳或舞女為主角的好萊塢電影如《跳舞熱》(*The Dancing Fall*)、《巴黎一舞女》(*The Dancer of Paris*) 等，或若干中國

¹⁸ 比如曾活躍舞場的北平李麗，其回憶錄已於前幾年出版。請參見李麗：《誤我風月三十年》（臺北：時英出版社，2010年）。

人拍攝的電影中，都曾出現過舞場或跳舞鏡頭，使觀眾對於跳舞文化有更直觀的認識。同為技術媒介的廣播、留聲機，乃至於西方舞者的表演，與此一舞廳裝潢、報刊圖像與更龐大的媒體文化脈絡連結而成的媒介景觀 (mediascape)¹⁹ 對上海舞廳文化的影響，也值得在文中進一步爬梳。

總的來說，此書論上海現代跳舞文化與都會政治，從物質文化的梳理、報刊文字、回憶訪談、歷史檔案的蒐集，以及政治文化、歷史背景的考證著手，考察從二十世紀初到中共建國後，上海舞廳與中國現代性樣貌，勾勒出豐富多元的二十世紀中國現代文化圖景。尤難能可貴者，在於作者的分析能將上海風華與當時的政治文化脈絡結合，呈現上海數十年都會文化發展歷程之全貌。作為讀者，亦是上海都會文化與現代中國文學的研究同好，閱讀此書是美好的歷程。以上看法，與其說是評述，不如說是心得，僅提出與作者切磋、交流。誠如上文所述，上海現代都會文化樣貌繁複多元，而上海研究花園中若能有如當時都會文化一般精彩豐富的研究成果，實為學界與讀者之幸；而其中，費嘉炯此本專著，無疑是近來相當值得關注的一本。

¹⁹ Arjun Appadurai,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 *Public Culture* 2.2 (Spring 1990): 1-24.